



进化、革命与复仇

“政治鲁迅”的诞生

Evolution, Revolution and Revenge:
Lu Xun's Political Vision

钟 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进化、革命与复仇

“政治鲁迅”的诞生

Evolution, Revolution and Revenge:

Lu Xun's Political Vision

钟 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进化、革命与复仇：“政治鲁迅”的诞生/钟诚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5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 - 7 - 301 - 29502 - 1

I. ①进… II. ①钟… III. ①鲁迅(1881—1936) — 政治思想 — 思想评论

IV. ①D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94983 号

书 名 进化、革命与复仇：“政治鲁迅”的诞生

JINHUA、GEMING YU FUCHOU;

“ZHENGZHI LUXUN” DE DANSHENG

著作责任者 钟 诚 著

责任编辑 高桂芳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9502 - 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yjy@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934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19.5 印张 300 千字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 - 62756370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

——鲁迅:《狂人日记》

一个人可以对他熟悉了的那些事物作出正确的判断,在这些事物上他是一个好的判断者。所以,对于某个题材判断得好的是在那个题材上受过特殊教育的人,在事物总体上判断得好的人是受过全面教育的人。所以青年人不适合听政治学。他们对人生的行为缺少经验,而人的行为恰恰是政治学的前提与题材。此外,青年人受感情左右,他学习政治学将既不得要领,又无所收获。因为政治学的目的不是知识而是行为。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自序

读者现在看到的这本小书孕育并产生于一段寂寞的时光中,最初只是想安静地修改自己幼稚的博士论文以打发无聊和并不怎样喜欢的闲适,不曾想,修改在不知不觉中几乎变成了重写。这样也好,仿佛存有的重担压迫着自己每天重复做着烦琐、枯燥却又偶尔让人略感欣慰的工作,慢慢积累,终于有了这些文字的出现。实话说,对于这本小书我是并不怎么满意的,逻辑方面尚欠通透,论证难免单薄,遣词造句上也常有捉襟见肘之感,然而,我仍希望它不会仅仅是一堆浪费读者诸君时间的废纸。

这也不是一本取巧的书。我虽不愿做书呆子,但也成不了“巧人”。写作只是为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或许是想寻求答案,或许是想质疑问题本身,在书稿完成之前,一切都不明了。甚至现在轮到自己作序的时候,也未必了然。但我还是很知足于这本书中并无什么微言大义,而只是老实地向大家呈现了作者的思考。

虽然我的专业是政治学,但我并不认为研究鲁迅的思想是不务正业。在学术“市场”显得空前繁荣的今日,身处学院高墙中的研究者已经越来越陷入专业化的“铁屋子”中,为学术而学术。不过有时我又觉着这种抱怨多少有些无病呻吟,因为给别人提意见总是世界上最容易做的事之一。仅就我自己而言,我是感觉到要去理解困扰自己的问题,固守专业的视角乃是不可行的。有时候,我们选定一个人物作为研究对象,并非因为赞同他或者反对他,而是由于被其思想的复杂性所吸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天马行空地发一些大而无当的议论,我们需要的是在不同的理论参照系和视角中艰难突围,尽管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是徒劳无功。

不得不承认,科学训练是大部分喜欢拿文化、文明说事的人所缺乏的,但正因其稀缺,才更有可能成为充满诱惑的肥皂泡。作为一个接近社会科学学术圈的“边缘人”,我越是试图进入到政治学的专业王国中,

就越是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让自己从这种充满虚荣感的“纯科学”享受中挣脱出来。起初,我以为这是自己暗藏的实用主义倾向对社会科学界普遍采纳的“解释世界优于改造世界”取向的不满,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与实用主义无关,而是由于自己不能回避追问那些流行的社会科学研究有意无意“存而不论”或“化约论之”的前提和预设。不过,应该说明的是,这种追问并未走哲学的道路,我并不具备哲人的天才,因此,通过对“孤独者”鲁迅的研究来缓解上述焦虑或许是一条可行的路径。对我而言,鲁迅的特殊性和吸引力在于其思想内部缠绕难解的“紧张”和“矛盾”,他的诸多主张、观念和行为模式难以用我们所习得的流行理论予以内在的解释和理解。或许这是一个重新出发的机缘,而把握这机缘的方式,在我看来,莫过于去领悟和反思鲁迅所走过的思想和行动之路。

说起来,刚开始决定认真写这本小书时还是很踌躇了一阵子的,到底是要一本正经地为其披上一件纯学术的外衣,还是索性让自己行文的思路彻底跳出学院体制设置的种种藩篱?我不能给自己一个确定的答案,于是便带着上述凌乱复杂的思绪用文字勾勒出这样一种鲁迅的形象来。当然,刻意求新以哗众取宠并非我之所愿,促进跨学科研究则更不是我的功力所能及,我试图做的,只不过是用自己比较习惯的方式(毫无疑问,这是指自己尚不太成熟的“学术”写作)来接近并试图理解一些让我困惑的问题。仅此而已。如果读者耐着性子读完后能有所思,甚至提出善意的批评,那对我来讲,无疑也是不小的收获。

自然,一本书的完成,并不会带来焦虑的完结,而只会引发更多的困惑。这困惑关乎另一种生活的可能,也关乎如何小心翼翼地验证这种可能。有时候想想,在我们生活的洋溢着技术狂热的时代,拥有并不浮夸的焦虑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如今已在山东教书的我还是经常会想起自己从前在天津和北京求学时的场景,既感慨于时光流逝的无情,也渐渐明白,“为人生的学术”并非容易之事。

很多年以前,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记者,去不同的地方,见不同的人,写下不同的文字;而现在,我每日的工作是躲在书房里,阅读、思考和写作。也许人生就是如此,你可能永远都无法实现自己最初的梦想,甚至曾经对这些梦想的执着在以后的日子里也会慢慢淡化为一次又一次温馨的回忆。人到中年,逐渐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过是这个复杂的神秘世界中一些微不足道的存在罢了,比梦想更重要的,是去理解这个

世界的过程。就像现在完成的这本小书,也许它只是为我自己而写,但从想法到文字,却并不完全属于我自己,它们更多地源于这个永远新鲜的世界对一位愚笨的求知者的恩赐。

是为序。

2018 年春,作者记于青岛即墨鳌山卫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人国”理想与文化民族主义	14
一、“人国”理想的确立	14
二、文化民族主义和对“志士英雄”的批判	25
第二章 文学与革命	40
一、十年沉黙与文学的无力	40
二、文学与革命的歧途	52
第三章 左联经历与历史“中间物”	75
一、对社会活动的参与及对知识人实践模式的批判	76
二、左联“实践”	95
三、历史“中间物”和鲁迅政治观的特色	110
第四章 政治道德基础的重构	127
一、人性、规则与正义	127
二、权力、公意与复仇	168
余 论	241
索 引	283
参考文献	289
后 记	299

导 言

(一)

毫无疑问,在中国现代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文学者或思想者像鲁迅这样,无论生前身后,都能引发范围如此之广、影响如此之深远的争议。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难免会遭遇这样的尴尬:当他们相信自己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本时(这多半会表现为某种主义或某种立场),鲁迅的文字却让他们或多或少会有坐立不安的感觉,因为他们不能用熟悉的分类方式来给鲁迅一种定位。^①赞同也好,批评也罢,我们都要承认,鲁迅的文和思比一般人想象的更复杂,鲁迅本人“抉心自食”的姿态在整个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上也显得颇为另类。

有趣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对鲁迅的认识是从“误读”开始的,鲁迅所拥有的模式化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的形象早已根植于我们的记忆中。通过阅读、思考和写作同这些记忆对抗,刚开始或许还有新鲜感,接下来,可能就更多的是一种体力和灵魂的双重“自我折磨”了。话说回来,“误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其实是常态,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鲁迅是谁”这个疑问,对于居家过日子毫无帮助,甚至,对于专注于考订史实的学问家们也意义不大。愿意花工夫关注这个问题的人,很可能是在“自我认同”和个体与共同体关系方面遇到了麻烦。这些麻烦,并不能由心理科学或实证社会科学来加以解决。要理清这些麻烦的头绪,一条也许可行的路径是进入鲁迅的思想世界,了解他与现代中国的关系。

(二)

“文学者”鲁迅是大家熟知的,那么,用“思想家”来定位鲁迅是否恰

^① 前些年,“鲁迅 VS. 胡适”这一话题很是热闹了一阵子,也确实触及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思想或政治议题,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对比在提供给我们一种有用的参照系的同时,其本身也可能会遮蔽一些重要的问题。

当？能成一“家”的大概都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正是在此意义上，李长之认为鲁迅不是思想家：“他不够一个思想家，因为他没有一个思想家所应有的清晰以及在理论上建设的能力”^①；“他是没有深邃的哲学脑筋，他所盘桓于心目中的，并没有幽远的问题”^②。而竹内好则对鲁迅作为一个独特的思想者毫不怀疑：“鲁迅不是有体系的思想家。……他在气质上，也和凭借概念来思考缘分甚远。做类推而不做演绎，有直观却无构成。他不擅长以目的和方法来对应世界，也就是缺乏立场这种东西。……规定他是什么很难，但规定他不是什么却很容易。”^③那么，李长之和竹内好的看法孰是孰非？我们若执着于简单地给出一个答案，其实并没有太大意义。因为，是否被认作“思想家”，并不是我们进入鲁迅思想世界所要获致的目的，而真正的意义，恰恰在这种探索和进入的过程中。也就是说，鲁迅的思想世界不是一个僵硬的客体，等待我们拿放大镜或者显微镜去做分析，而更应将其看作是一种能被不断激活同时也必须认真反思的传统。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对既有研究路径的反思以及跨国跨地区学术交流的增多，国内鲁迅研究界在概念、方法和理论等层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创新，尤其是历史“中间物”概念的提出和广泛的探讨，使得鲁学不再是一座“肃穆的‘古堡’”，鲁迅走下了神坛，他丰富而矛盾的内心世界成为大家关注的中心，“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也开始真正得到落实。然而，内心丰富而矛盾的鲁迅不光需要“了解之同情”，他需要的还有“批判性反思”，这种反思的过程并非用我们今天既有的知识框架和问题意识对鲁迅的思想世界进行俯视或断章取义——这种方式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搔不着痒处”。毋宁说，这种反思和探索更多的是我们理解世界和自身的一个契机。

鲁迅之为“思想者”，恰在于他从不纯粹和抽象地“思想”，他始终为自己所处的历史情境和生活世界所困扰，正如同我们今天为各种宏大叙事和生活琐碎所包围一样。不同的是，对于“无物之阵”，他举起了投枪以作“绝望的抗战”，而我们则更多的是在宁静的书斋中通过阅读鲁迅去揣摩、体味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复杂性与可能性。从此意义上讲，鲁迅，对

① 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

② 同上书，第160页。

③ [日]竹内好：《鲁迅》，载[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编，李冬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46—147页。

于我们的思考来说,是一个必要的“他者”,但绝不是一种工具,也不是一种简单的自我表达的中介。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自己知道,不特并非创作者,并且也不是真理的发见者。凡有所说所写,只是就平日见闻的事理里面,取了一点心以为然的道理;至于终极究竟的事,却不能知。便是对于数年以后的学说的进步和变迁,也说不出会到如何地步,单相信比现在总该还有进步还有变迁罢了。”^①当然,对于鲁迅思想及其与现代世界的关系,学界已有诸多著作和论文探讨过,本书不打算再简单重复这些探讨,而是希望从一个较新的角度来切入,这个角度就是“政治鲁迅”。这里需要说的是,选择“政治鲁迅”作为切入点,并不仅仅是为了弥补“空白”,做知识积累的工作,更不是因为鲁迅的政治观看起来简单、不成体系而有此“取巧”的选题。

鲁迅留给我们的主要印象乃是“文学者”,但他并非一位纯粹的文学者,而是一位终生都未脱离政治纠缠的文学者,尽管他的政治思考并未以概念化、体系化的方式呈现。在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流行谱系中,我们一般找不到“鲁迅”这个名字。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于政治的思考就不重要,也许原因恰恰在于,他对政治的思考有其特殊难解之处,难以用一种便携化的方式来提取、归纳。当然,这仅仅是一个未经验证的“假设”,而本书的写作,即可看作是对这一假设进行验证。

(三)

鲁迅没有受过专业的学院派的政治学训练,在他留下来的文字中,也没有系统的关于政治的论述,但是,在客观上,他的思想对中国的政治形成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以直接的政策建议的方式,而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文化心理的方式,对现实的政治(以及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阶层和民众)产生长远的影响。更具体地讲,鲁迅所产生的影响,一方面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或借助意识形态推动的,包括将鲁迅神化或贬低歪曲鲁迅思想的方式;另一方面则是源于鲁迅思想的特异性,可以由不同的严肃的研究者做出各种“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的诠释。这两个方面的缠绕和纠结,使得对鲁迅思想的政治解读变得丰富、多面,世纪之交

^① 《我们怎样做父亲》,载鲁迅:《鲁迅全集》卷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

关于鲁迅的论争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必须指出的是,由于众多制约因素共同发生作用,这些解读有相当一部分偏离了鲁迅的原意,因此探求真实的鲁迅的政治世界,就成为一个颇有意义的课题。在这个探求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可以对论争所涉及的政治问题作一种基于学理思考的自成“一家之言”的回应;另一方面,通过深度了解鲁迅这样一个被有意无意简化的人物的复杂和悖论式的思想世界,我们或许也能对近现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特质得出一点新的看法。

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鲁迅研究被认为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但通过对那个年代鲁迅研究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政治”缺席的现象非常明显。有论者认为:“鲁迅研究极大地忽略了大革命之后鲁迅的重要转变,鲁迅在不同时期对于‘革命’话题的反复强调在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者这里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呈现……而正是这种被剥离了政治意义的鲁迅,在某种意义上,使得鲁迅极大地丧失了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意义,也令鲁迅世界复杂化的时代价值大大降低。”^①这一时期鲁迅研究的代表作几乎都是以鲁迅复杂的内心世界为研究主题,从李欧梵、钱理群到汪晖,都是如此。^②进入90年代,伴随着“告别革命”思潮的兴起,鲁迅又成为一个颇受争议的对象,有关注其在革命传统中的地位以及一以贯之的批判精神的,如汪晖;有批评其反自由主义特征的,如朱学勤;也有论证其思想才是真正得“自由”之精髓的,如郜元宝。不难发现,诸如此类的争论,其实都涉及“政治”的层面,但最终难以真正展开对话,其原因就在于论者对鲁迅的政治观的理解方式都从各自的知识生产体系出发,有所洞见,亦有不见。^③

(四)

不得不承认,长期以来,国内和海外学术界关于鲁迅的研究多数着

-
- ① 殷之光:《作为问题与实际的“鲁迅转变”——一项简单的历史考察》,载薛毅、孙晓忠编:《鲁迅与竹内好》,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152页。
- ② 当然,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于20世纪80年代在国内出版的著作中有关鲁迅的分析是以对“五四”的反思作为切入点的,其中涉及鲁迅的政治观,这值得我们充分注意。
- ③ 应该说,任何时期的“鲁迅研究”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开时代政治的影响,即使研究者有意抵抗这种影响,也可能被看作一种颠倒的“政治化”。本书所关注的“政治鲁迅”并不是指“鲁迅研究”与时代政治的关系,而更多的是通过某些特定视野呈现的鲁迅本人关于政治的思考。自然,这种关注会带有我们这个时代的痕迹,但这非但不是研究的弱点,反而是研究能得以展开的必要的条件(前提是我们对此有明确的意识)。

力于对其文艺创作的分析、人文精神和思想历程的挖掘或探讨其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研究路径多为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或意识形态式的。^①即使是对“政治鲁迅”的探索,大多也在上述路径的影响之下。这些探索关注的问题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鲁迅思想与政治实践的关系;二是鲁迅思想与政治道德基础的关系。围绕这两个问题,我们这里对学术界已有的研究作一简要的回顾。

1.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已出版的数量众多的著作及论文都有所涉及,对此问题的回答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 “无建设”的消极抵抗。这一类观点看到了鲁迅对于“黑暗”现实的抵抗和批判,但同时认为,这种抵抗和批判在新的形势下是消极和“无建设性的”,并且落后于时代的要求。

梁实秋认为:“我觉得鲁迅先生向来做反面文章,东批评,西嘲笑,而他从来不明明白白的公布他自己的积极的主张和态度。”^②钱杏邨认为:“阿Q时代固然死亡了,其实,就是鲁迅他自己也已走到了尽头,再不彻底觉悟去找一条生路,也是无可救济了。当然的,他所以不能表现时代的原因,是他根本上没有认识时代,和世界政治思想简直没有接近……”^③杜荃(郭沫若)认为:“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④李长之认为:“倘若以专门的学究气的思想论,他根底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常说不能确知道对不对,对于正路如何走,他也有些渺茫。他的思想是一偏的,他往往只迸发他当前所要攻击的一方面,所以没有建设。”^⑤

(2) “共产主义革命的同路人”或“革命的知识分子”。此派观点在

① 关于海外学术界鲁迅研究的状况,可参见王家平:《鲁迅域外百年传播史:1909—200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以及Irene Eber, “The Reception of Lu Xun in Europe and America: The Politics of Popularization and Scholarship”, in Leo Ou-fan Lee, ed., *Lu Xun and His Leg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② 梁实秋:《答鲁迅先生》,载梁实秋等:《围剿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③ 钱杏邨:《死去了的鲁迅》,载梁实秋等:《围剿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④ 杜荃(郭沫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载梁实秋等:《围剿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

⑤ 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161页。

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被广为接受,认为鲁迅紧跟时代潮流,最终认同了共产主义的救国路线和政治主张。

何凝(瞿秋白)对鲁迅的思想历程作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论断:“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①陈涌认为:“自从五四运动以来,有大批革命的知识分子,在认清了中国的现实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与特点之后,便抛弃了原来已经过时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而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并且终身为这个思想所指示的方向奋斗,而鲁迅便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②

(3) 历史“中间物”。这类观点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内鲁迅研究界形成的主流观点,认为鲁迅基于“清醒的现实主义”,一方面意识到个体对于政治现实的无力,另一方面又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实践的姿态,为打开未来的可能性空间做出努力。

钱理群认为:“鲁迅的‘中间物意识’,最基本的历史特征,即是‘自我’置于社会发展、人类进化的广阔的时空中来考察。一方面,在社会、人类、宇宙的无限空间里,在历史发展的永恒时间中,充分地显示出‘自我’的有限性与短暂性;另一面,‘自我’却又承担着无限空间、永恒时间里形成的历史重负。前者是一种客观存在,后者是鲁迅这一代人的自觉选择;鲁迅既清醒于前者,又执着于后者,就陷入了既无可避免、又无以解脱的巨大矛盾与精神困境中。”^③汪晖认为:“只有意识到自身与社会传统的悲剧性对立,同时也意识到自身与这个社会传统的难以割断的联系,才有可能产生鲁迅的包含着自我否定理论的‘中间物’意识。……相对于早期的与社会传统的分离意识和浪漫主义的孤独精神,20年代鲁迅却再一次把自己与传统相联系,从而产生了第二次觉醒:独立出来的自我不仅不是振臂一呼聚者云集的英雄,而且实际上并未斩断与历史传统的联系;自我的独立意识仅仅是一种意识。正是以这第二次觉醒为起点,鲁迅的‘中间物’意识,尤其是其中的自我反观、自我解剖、

① 何凝(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载何凝编:《鲁迅杂感选集》,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序言”第14页。

② 陈涌:《鲁迅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③ 钱理群:《心灵的探寻》,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页。

自我否定理论才得以建立。”^①王乾坤认为：“不可以将（‘中间物’）这个命题还原为中国本世纪早期流行的历史进化论。即便从其建设性的功能上讲，后者作为一种经验性原则，通常向人许诺的，是一种直线性方向。……进化论固然曾经支持过鲁迅的社会希望，但作为一个灵魂的盘问者、命运的关切者，鲁迅同时敏感地悟到进化论对生命的无情，也掩不住对死亡的悲怀。”^②“‘中间物’构成了鲁迅全部思想的一个轴心概念。其他思想可以看作这个轴心的一个个展开。”^③

（4）通过文学提供的“主体性”来面对或介入政治。此派观点强调鲁迅的“文学”具有抵抗意识形态侵袭的特殊性，使鲁迅获得了真正自由的“主体性”，并认为鲁迅正是通过这种特殊的文学来面对或者介入政治现实的，从而为中国政治的发展带来了一种独特的可能性。

竹内好认为：“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不是从属关系，也不是相尅关系。迎合政治或白眼看政治的，都不是文学。所谓真的文学，是把自己的影子破却在政治里的。可以说，政治和文学的关系，是矛盾的自我同一的关系。”^④“真正的文学并不反对政治，但唾弃靠政治来支撑的文学。它所唾弃的文学，在孙文身上看不到‘永远的革命者’，而只看到革命的成功者或革命的失败者。为什么说唾弃呢？因为这种相对的世界，是个‘凝固了的世界’，没有自我生成的运作，因而文学者只会死灭。文学诞生的本源之场，总要被政治所包围。这是为使文学能开花的苛刻的自然条件。娇弱之花没有生长的可能，劲秀之花却可获得长久的生命。我在现代中国文学那里，在鲁迅身上看到了这一点。”^⑤张宁认为，鲁迅所致力于的对国民主体性的建构是“一种拒绝在一个分层的社会里从‘上层’寻求精神依赖的尝试，一种致力于把民众‘从政治的客体变成政治的主体’的艰难实践。……习惯于仅仅从国体、政体等制度建设上看的人，是不大能够发现鲁迅这种致力于把民众‘从政治的客体变成政治的主体’的艰难努力的；习惯于‘从上面’看的人，也不大可能体会鲁迅那始

①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109页。

② 王乾坤：《鲁迅的生命哲学》（增订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2页。

③ 同上书，第14页。

④ [日]竹内好：《鲁迅》，载[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第134页。

⑤ 同上书，第135页。

终稟有的‘从下面’看的眼光”^①。张旭东认为：“鲁迅的写作是完全的、纯粹的政治性写作。理解鲁迅作品的关键在于理解这种政治性何以就是最本质、最积极的文学，而不是从一些教条的、意识形态的（比如小资的、唯美的）标准出发，去问为什么鲁迅写作同‘文学’若即若离。鲁迅对黑暗的感受是非常深的，所谓黑暗就是‘死的说教者’，就是否定生命的东西。当生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时候，它是不惜与一切宣战的，但这种战斗意义的‘恶’和‘憎恶’，也是善和爱。这种错综复杂深沉低回的味道，经鲁迅的文字洗练，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和精神的一种基调，而鲁迅的作品，也就此成为现代中国集体境遇的一个持久的象征。”“鲁迅以他的写作，通过它的存在，告诉人们，旧就是新，全新的东西只能从不变中出现，但这个不变却必须在自身内部进行最激进、最整体性的革命；这个革命不是要把自己带到一个别的地方去，而是要在这里，通过发动多数人，来它一个‘换了人间’。”^②

上述四类观点的差异源于视角的不同、所掌握史料的多寡以及论证的方式有别。其中，“历史‘中间物’”说建立在较为严格和规范的学术论证基础上，比其他三类观点更具解释力，但仍过于偏重“心性”和价值层面的探讨，忽略了对鲁迅带公共性色彩的“实践取向”的深层关注，从而对鲁迅面对真实世界的现象所产生的思想悖论缺乏专门的讨论。

2. 对于第二个问题，既有的研究文献有以下几种回答：

（1）走向“意图伦理”。此派观点认为虽然鲁迅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可以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但仍无法彻底和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决裂，从而走向了意图伦理，以“遵命文学”的形式成为现实政治的牺牲品。

林毓生认为：“鲁迅意识的特点呈现出一种深刻而未获解决的冲突：一方面既有全盘性的反传统思想，但另一方面却从知识和道德的立场献身于一些中国的传统价值……鲁迅意识中的冲突，并不在于情感和思想这两个范畴之间，而在于思想和道德的同一范畴之内。换言之，因为鲁迅出于理性上的考虑和道德上的关切，在完全拒绝中国传统的同时，又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中的某些成分是有意义的，所以这种冲突的发

① 张宁：《无数人们与无穷远方：鲁迅与左翼》，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② 张旭东：《“让鲁迅的文本自己说话”——张旭东访谈录》，载《文艺研究》2009年第4期。